昆明学院学报　2020，42（2）：1～5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儿童文学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刊载的四篇文章，涉及儿童文学的译介出版、创作和成长题材作品研究。其中关于儿童文学译介的访谈一文，以访谈的形式较为全面的对一个以将中国儿童文学推向世界为己任的出版社作了具体的介绍。对作家创作的研究之文，立足经典研究现代童话创作，从安徒生童话创作中的民间文学因素和哲思以及作家童话创作的现代化色彩三个视点探讨汤素兰童话创作对经典童话的继承。其他两篇有关成长题材的作品的研究，视点各异，前者站在儿童文学研究的立场观照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从成长的角度分析西游记所体现出来的成长小说的属性；后者站在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研究西方民间童话，分析揭示西方民间童话中傻儿子形象多重文化意义及其成长特点。

从对外传播到版权输出：中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之路

——海豚出版社策划总监梅杰访谈录

花　萌[1]，石　琼[2]
（1.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江苏 徐州 221000；2. 上海电力学院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00）

摘要：梅杰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曾任海豚出版社童书编辑、策划总监。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海外译介，他以在海豚出版社的社名变迁、其童书翻译的模式和过程、作品的海外接受为切入点，深入表达了自己基于童书出版实践的观点：中国儿童文学的海外译介应对外宣传先行，版权输出跟后；中国儿童文学译介的明天是美好、开阔的，其世界性阅读的那天终将到来。

关键词：儿童文学译介；海豚出版社；对外传播；版权输出；梅杰；访谈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0）02－0001－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20.02.001

From Overseas Publicity to Copyright Export: The Route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Planning Director in Dolphin Books

HUA Meng[1], SHI Qiong[2]
(1.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Xuzhou Kindergarten Teachers College, Xuzhou, Jiangsu, China　221000;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Shanghai, China　200000)

Abstract: Mei Jie, a children's literature expert, used to be the former editor and planning director of children's books in Dolphin 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ming history of Dolphin Books, the mode and process of children's book translation in Dolphin Books and the overseas acceptance of children's books published by Dolphin Books, Mei expresses his views on the oversea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ontending that the verseas publicity should be given the priority before the copyright export, and therefore, the future of the oversea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promising and will be more broadened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readers.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Dolphin Books; overseas publicity; copyright export; Mei Jie; interview

---

收稿日期：2019－09－16
基金项目：2017年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立项项目“美国的文学翻译评奖机制研究”（17jsyw－18）；2019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英美儿童文学奖项评奖机制研究”（2019SJA1034）。
作者简介：花萌（1981—），男，江苏宜兴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石琼（1977—），女，江苏泗洪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自 1971 年以来，海豚出版社就作为外文出版社旗下的儿童文学编辑部而存在。过去几十年，海豚出版社一直以对外译介中国儿童读物为立社使命，其出版史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译介史。值得一提的是，自 2012 年起，海豚社陆续推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英文双语版），自行组织翻译和出版中国儿童文学，在业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这套书已出版了 25 种英文版，另有韩文版、土耳其文版、马其顿文版等陆续推出）。2017 年上海书展期间，笔者有幸采访到该套丛书的策划和责编——海豚社的策划总监梅杰先生（访谈中简称为“梅”）。梅杰曾策划过《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海豚学园》《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等丛书。编辑和写作之余，他还一直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先后出版童书评论集《童书识小录》和《丰子恺札记——泛儿童文学随札》。其中《童书识小录》[1] 由蒋风题词，金波题名，朱自强作序，徐鲁选评，孙建江作跋，曹文轩赞曰：“梅杰对中国当下儿童文学的格局与运行密切关注，并有敏锐而透彻的观察力。细致入微的解读，鞭辟入里的分析，简洁明快的文风，给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带来了新鲜的气息。”

访谈中，梅杰主要从海豚社社名变迁、译介模式和译作的海外接受三个方面介绍了海豚出版社的外宣，也对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提出了己见。他认为对外宣传先行，版权输出随后是中国儿童文学实现世界性阅读的必经之路。本文还需特别感谢经由梅杰先生介绍的海豚社英文责编曹巧丽女士（访谈中简称为“曹”），她在有关翻译的具体细节方面给予了重要帮助。

一、海豚出版社的社名变迁

花：① 首先，我们非常好奇，您之前在海豚传媒工作，是什么机缘让您从武汉辗转到北京，加入海豚出版社的？

梅：2009 年，俞晓群出任海豚出版社社长。我那时已在海豚传媒工作，但是感觉身居武汉，没有达到做事情的理想状态，有改换工作的念头。2010 年，我萌发了去海豚出版社工作的念头，于是向俞社长表明意愿，自信在儿童文学、海豚书馆、图书推广等方面都可施展。2011 年 2 月，按特殊人才引进，我进入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任三编室主任（文学馆总监），2016 年升任策划总监。俞社长本是让我牵头出版《丰子恺全集》[2]，我却觉得此举未能人尽其才。于是打算自发开辟出一条儿童文学外宣与本版相结合的出版之路，即，用市场化的儿童文学出版养非市场化的《丰子恺全集》（当然，我后来又以书养书，以市场化的丰子恺出版养非市场化的《丰子恺全集》，这是后话了。至于《丰子恺全集》成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则更是后话）。[2]

花：最初加入海豚出版社时，您了解它之前的翻译和出版情况吗？从外文出版社儿童读物编辑室到外文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再到海豚出版社，社名更替背后的海豚出版社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梅：有了解。我是一个有历史癖好的人，喜欢追根溯源。初到北京，我就萌生了研究海豚出版社外宣史的想法，于是拜访了海豚出版社第一任社长李树芬老师，向她请教如何做外宣出版工作，至今仍与其保持联系。海豚出版社是国内唯一一家中央级的承担外宣出版任务的专业少儿出版社，自上世纪（20 世纪，以下同。）70 年代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对外译介。李树芬和姜成安两任社长做了很大贡献，在李老师那个时代，对外译介童书就达千种以上。在海豚社最辉煌的时期，曾经以 8 种语言翻译出版叶圣陶、丰子恺、张天翼、严文井、圣野、孙幼军、葛翠琳等前辈作家的作品，向世界各国发行，产生很大影响，至今传为佳话。至于社名的更替主要跟外文局的自身发展相关。外文局旗下的出版社最多的时候有十几家，经过整合后现在只有七家，分别是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新星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和朝华出版社。海豚出版社于 1986 年建社，但当时只是外文社的副牌社，只负责中国儿童读物的外宣，并不具备出版中文图书资格。2006 年从外文社独立出来后，有了自己独立的书号，同时具备了出版中文图书的资质。2011 年，海豚出版社性质由国家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单位，但其对外宣传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一直未变。[3]

花：在童书外译的市场份额方面，独立后的海

①花萌，本文第一作者，访谈人，访谈中简称为“花”。

豚出版社和以前相比有何变化？

梅：如今的海豚出版社拓宽了出版类别。脱离外文社的头几年，童书外译走了几年下坡路，呈现萎缩状态，主要靠翻印老海豚的旧书来维持。近几年，在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号召下，我社再次集中力量发展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目前，我社“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已推出中文 30 部。[4]此套丛书由中国外文局组织、统领，在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大力配合下选编，已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国际上亦引发了一定关注，有些书目已有中国台湾版、韩文版和土耳其版。需要指出的是，我社出版的目的是外宣，有专门的出版发行渠道，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因此不是特别关注市场份额。要谈市场份额需以版权输出为前提。

二、海豚社的翻译模式和过程

花：看来是否重视市场份额与翻译目的有关。我也曾电联过李树芬老师以了解海豚社初期的翻译和出版模式。据她介绍，海豚出版社首先进行书目选择，书目确定后将中文原稿交给文本编辑进行校对，并由中文主编定稿。中文定稿后，专家组根据文本内容和意识形态等相关条件确定译出语种和发行目的地。接着，相关工作人员将中文定稿[6]和专家意见反馈给外文局，由外文局统筹安排译者翻译，再由英文主编审稿定稿。之后再将定稿后的译文交回海豚出版社，由双语文本编辑负责原本和译本比对，审查是否存在误译和漏译。最后由出版社把终稿交给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通过专门的途径出版发行。想向您请教的是，当下的海豚社在翻译程序和模式方面是否有所改变？

梅：据我了解，改变较少，现在基本还是按着这个模式选本和翻译，尤其是翻译，依然是三道工序，非常严谨。翻译文本内容和意识形态仍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花：海豚社在文本选材方面有何标准？主要由哪些机构或个人参与？有没有各方意见不一的时候？这时候怎样处理？

曹：国内出版的图书选题一般由各部门的同事各抒己见，集体讨论可行性并策划方案。但外宣图书情况不同，因为外宣图书是由国图公司对外发行，国内同事通常缺乏相关经验，所以不参加选题论证会。在这种情况下，选题由责编和总编提建议，最后由社长拍板决定，施行的是社长主编决定制。因此，很少会出现意见不一的情况。选题确定后，我们会撰写项目资料，向外文局或国家相关基金项目提交申请。如果申请成功，则投入运作。总体说来，外宣文本的选材标准主要有三点：一、要能体现中国特色；二、要能吸引国外读者；三、要具可操作性。所谓可操作是指能找到合适的原本，能找到合适的译者，以确保选题的可行性。

花：在查阅梳理海豚社出版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八九十年代外译的儿童读物多是改编本，如“美猴王丛书”（1984 年，李树芬改编）、《白鹅女》（1985 年，吴敬芦改编）、《孔雀公主》（1986 年，婷婷改编）、《长发妹》（1986 年，丁宇真改编）、《七颗宝石》（1988 年，李洪恩改编）……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海豚社还会对原作做改编吗？选本是否都是全译本，是否存在节译、选译的现象？如有节译选译，又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曹：现在的译介基本没有改编，我经手的大部分项目基本都是全译本。如果出现选译，多是因为原本过长，以“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为例，如果中文版本中有很多篇童话或短篇小说，字数太多，过于厚重，在英文版中就会被删去部分篇章。

花：说起翻译，海豚社对译者有何资质要求？在翻译过程中，有何翻译标准？

曹：传统上，海豚出版社的译者多是外文局的专家，遗憾的是，近年有些高水平的专家译者去了高校或者中央编译局，这使得我社也必须去翻译公司觅寻合适的译者。译者选拔一般以小样试译为基础，然后由编辑审读译稿后挑选“人文合一”的译者，即译者和所译文本相匹配。至于翻译标准，理想状态下当然是“信、达、雅”，然而现实中，求“雅”极难。如今的翻译出版已经企业化、市场化，出版社和翻译公司都要考虑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基本只求“信”“达”。我社的基本翻译原则是“信”，要求译者忠实原文，尽量避免歪曲原意的现象。

花：海豚社是否还会聘请外国译者？拥有译作定稿大权的英文主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英文主编的定稿主要考察什么？是语言表达、文化传播还是意识形态方面？

曹：我社现在很少请外国专家做译者，但会请外国译者审稿和定稿。一些重要的译作，如《钓鱼岛历史真相》[3]由本国译者翻译完成后，交由英文编辑进行初审和复审，第三审即终审则需日本专家完成。英文主编当然是中国人，主编定稿时主要考量文本内容的意识形态。仍以《钓鱼岛的历史真相》为例，主编会侧重看译者的语言是否恰当，要确保英文表达符合我国的意识形态。

梅：我们的翻译至少经过三道工序，中国译者翻译初稿—外国专家审译—英文主编定稿。外国专家审译主要是避免中国式英语出现，保证行文更地道，表达更准确。最后一关必须保证掌控在中国专家手里，他们在外国专家的盲区里进行修改，确保译本符合和适合中国国情。

三 、海豚出版社译作的海外接受

花：译作定稿后就要出版发行，您能给我们介绍下海豚社海外发行的渠道吗？我们很想知道，这些作品如何进入国外读者阅读视野？

梅：我社的儿童文学译介旨在外宣，目的是让世界接触并了解中国儿童文学。因此，我社的主要任务是选材和翻译，海外发行和销售工作则由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专门负责。一方面，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在国内有很多外文书店，对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销售外宣图书；另一方面，它在国外有很多国际书店，直接面向海外读者销售外宣图书。外文局苦心译介多年，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海外如有需求，有时会直接电话至外文局下单，然后通知出版社供货，再通过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的发货渠道售至海外，如我社的《丰子恺全集》就是以此种方式被一个日本书店购去不少。此外，我社的海外发行还利用外宣本土化优势。所谓外宣本土化就是用国外书号发行我社译本并在当地销售。外文局在海外成立了不少出版社，如法国百周年出版社、香港和平书局、长青图书（美国）有限公司，依托这些出版社实现外宣本土化，其销售效果较第一种方式更佳。当然，国外的高效接受最好还是依靠版权输出，这也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花：是啊，如能将本国生产加工的图书版权输往国外市场当然是最佳的方式。我们知道，贵社的译本有不少参加国际书展的机遇，我们是否能借此“东风”力促版权输出呢？

梅：外文局每次参加国际书展都会把我社的外译精品一并带出，国外读者的兴趣还是蛮大的。以“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书系”为例，在书展上来询问版权的国家特别多，大家公认此套丛书代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高度。遗憾的是，经费问题常令我社毫无余力给予必要的版权资助，合作意向不得不付之东流。令人欣慰的是，韩国买去了此书系的 11 种版权，土耳其买去 3 种版权。我们有理由相信，该书系在未来的版权输出方面会愈来愈好。

花：译作出版发行后，贵社是否关注其在国外的接受情况，如销售量，图书馆馆藏量等？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贵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外译本在国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如今“精品书系”的接受度却有些差强人意，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梅：说实话，我社较少关注译本海外发行的后续问题。至于您提到的“今不如故”的现象，我想这可能与国家的投入力量有关。相对而言，国家以前在翻译和发行上投入更大，外文局当年名家云集，杨宪益、萧乾、徐迟、冯亦代等译界大师都曾专职在外文局工作，翻译力量很强。当时外文局海外驻点和书店众多，国图公司是其译作对外发行的唯一渠道，译作发行渠道单一并且畅通。而今，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的海外驻点少了很多，尤其是网络化之后，发行渠道多样化，国图不再是唯一渠道，所以现今发行量严重受限，可能不及过往的十分之一。

四、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

花：聊了那么多贵社的过去和现在，接下来请您展望下未来吧。您觉得中国儿童文学怎样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呢？

梅：以我个人观点，儿童文学的可译度较之于成人文学来说更高，因为它纯粹，可跨越阶级、民族，更易引发“移情”和“共情”。我主张为中国儿童文学设立一个翻译基金，国家每年挑出几十部品质卓越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精品，对译者重奖并资助出版。我们无需刻意去助推翻译，而应让译者与文本自配，让翻译进入原生态之境，实现自我孵化功能。很多时候译者更了解读者是谁，其欲为何。依目前情况看，外宣的海外影响有限，所以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需坚定开拓版权输出之路。我社几十年来辛勤译介在很大程度上已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性阅读夯下了不错

的基础，但如欲深入异域读者之心，恐怕仍需以他者之嗜为考量。以目前的译法来看，我觉得没有必要总把忠实原文摆在首位，而应以全方位的开放心态让世界阅读中国儿童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说，版权输出比外宣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尤其体现在选本和翻译层面。源语语境内的主持方要尽量减少版权输出时的干涉，否则目的语语境内的受众会质疑版权输出的纯粹性和目的性。另外，版权输出还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里有一部孙幼军的著作，土耳其的一个书商非常有兴趣，要引进它的土耳其版，但我们主动提醒选本内含有猪的内容，客户就放弃了版权引进。其实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很简单，版权输出时将有关猪的内容删掉即可。

花：如此看来，对外宣传和版权输出相比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您会用版权输出的方式策划“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吗?

梅：我会把外宣和版权输出相结合，外宣先行，输出随后。首先将中文翻译成英文，因为英文版译作的受众面更广，版权输出机会更多。此外，我们应不设限制，接受目的语语境内各种形式的重译与改译。如有机会再次策划此套丛书，我会把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大、更快，希冀 7 年之内出版能达百种。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略知一二，若时代能倒回，海豚社的童书译介也可按年代推出，分批译介儿童文学佳作，如民国时期、上世纪 50—80 年代、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分期筛选，逐一推介。尤其是对篇幅适中的优品做整体规划的译介而非零星随意的译介。对“精品书系”，我的愿望也是如此，目前“精品书系”已经推出 30 种，多语种也在进行之中，基本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第一次成规模地进行整体性向海外推介，如今大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做完“精品书系”，我还想推出“经典书系”，把故去的前辈儿童文学作家的中长篇再做出来，重现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辉煌历程。同时在“精品书系”和“经典书系”的基础上，推出“原创书系”，以译介 21 世纪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原创新作为主，向海外推荐中国年轻一代作家的儿童文学成就。[14]我始终坚信儿童文学译介的明天是美好的，会越做越开阔，越做越有劲儿。中国儿童文学世界性阅读的那天终将到来。

花：2016 年曹老师喜获国际安徒生奖，其《草房子》《青铜葵花》的英译本在英美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您觉得其获奖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性阅读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梅：曹文轩获奖肯定会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海外译介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当下的世界格局，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化，其规则均由西方制定。国外的大部分读者并不了解中国儿童文学，曹文轩的获奖光环或许会吸引国外读者的目光关注其作品，继而有兴趣再去关注其他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近年来，国家集中力量力推曹文轩，不少国内出版社组织力量译介其作品，在国际书上展亮相，并发行至海外。从这个角度上看，曹文轩的获奖与国家层面的推介相关。《草房子》《青铜葵花》在英美读者中产生影响很正常，国外读者再怎么漠视中国儿童文学的成就，也会对获安徒生奖的知名作家给予一定的关注和研究。这对中国儿童对外译介和版权输出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花：梅老师，您看，如今国内的中国儿童文学出版如火如荼，蔚为大观。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国内研究本国儿童文学和外国儿童文学的学者却不多，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

梅：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有人说儿童文学简单，其实不然。朱自强教授认为，儿童文学是教育成人的文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儿童文学要比研究成人文学难度更大。从成人到成人，通道相对简单、畅通，而在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间架接桥梁实属不易。儿童文学研究者要是个杂家，需要了解甚至精通多门学科，如儿童心理学、儿童美学、儿童认知学等等。如若无此种知识铺垫，直接研究儿童文学作品，无异于“隔靴搔痒”，无法做到客观、全面、深刻。此外，对儿童文学重视度有待提升。目前研究儿童文学的高校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单靠北师大、华师大、浙师大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院校，恐怕难以支撑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眉睫．童书识小录［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
［2］丰子恺．丰子恺全集［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
［3］韩结根．钓鱼岛历史真相［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